

明镜

评论

铁路“赔偿限额”实为法律垄断

“赔偿限额”形成了法律垄断,损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,更破坏了法律的尊严。而这种垄断能一直延续下来,可真是个奇迹”。

■杨涛

“7·23”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目前进入善后赔偿阶段。而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故的幸存者周君,还在为3年前那场浩劫留下的伤痛而奔波。相关信息显示,当年胶济铁路事故,铁路方面对于死难者的赔偿是每人20万元。显然,给周君的赔偿不可能高于这个数。((《今日早报》7月27日)

周君的一只假肢,费用就是80万元,至于她的治疗费、康复费、误工费等等,更是天文数字,区区20万元,不过是九牛一毛。我们不得不感叹于铁道部门的“牛气”,不但垄断了所有的铁道运输及关联企业,而且在赔偿问题上还享受着超市场主体的待遇,将法律也垄断起来了。

此话怎讲?根据2007年施行的《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》,铁路运输企业对事故中每位旅客的赔偿限额统一都是15万元,对行李损失的赔偿限额为2000元。而1992年修改的《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》规定,赔付的保险金最高为2万元。也就是说,在火车事故中,不管是死是活,不管损失多大,也不管后续治疗要多少钱,铁道部门都是17.2万元一口价买断。尽管此次“7·23”事故每位死难者家属可得50万,但

这50万包含的是“事故赔偿金、一次性专项帮扶款以及爱心捐助款”。

而根据2006年1月29日国务院批准的《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》,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为40万元。坐火车与坐飞机的同为国家公民,为何同命不同价?

其实,任何所谓“限额”的规定都是违背常理和违背法律的。人的生命无价,人的治疗费用更不能限额。《侵权行为法》规定,“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,应当赔偿医疗费、护理费、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,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。造成残疾的,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。造成死亡的,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”。公民伤亡赔偿金有着一系列法定计算标准,又何来“限额”一说?

当然,有人要说,铁路交通事故伤亡赔偿限额的标准是国务院发布了《条例》的。但是,《条例》只是行政法规,而《侵权行为法》是法律,位阶比行政法规更高,在司法实践中,理应适用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。

以上种种追问,我们完全可以看出,“赔偿限额”形成了法律垄断,损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,更破坏了法律的尊严。而这种垄断能一直延续下来,可“真是个奇迹”。这种法律垄断,和铁道部门的经济垄断一样,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!



接待用上“宝马”就能提升形象吗

舍本逐末“宝马加身”,非但提升不了形象,还有可能给国家形象抹黑。

■闫祥岭

针对网上曝光南宁市交警支队配备多辆宝马警车一事,该支队一名负责人表示,11辆宝马警车的购置符合程序要求,主要用于“高级接待”,是“为提升国家和广西的形象”。

就交警而言,工作有一定特殊性,使用相对先进的车辆,有助于提高办案和维护交通秩序的效率,提升服务水平。但这里所谓的相对先进,相对的是社会普遍水平,而不是与少数高端用户相比,把先进变成豪华。

设想一下,如果一个交警支队就可

以配备11辆宝马汽车,机关单位照此攀比,纷纷购置使用豪华车辆,一个城市、一个省区乃至全国机关单位会有多少豪华车?这在社会各界对公务用车议论纷纷、国家正在探索规范途径之际是难以想象的。

还有车辆用途问题。如果购置部分高性能车辆,用于办案出现场、追嫌犯等紧急业务,相信不会招致非议。遗憾的是,南宁市交警支队是要用宝马警车作“高级接待”,这就偏离公众期待了。值得注意的是,先前爆出的广东、浙江、山东等地出现豪华警车新闻,有关方面的解释都是用于接待。这说明,在公共资源配置使用上,政府部门到底应该向

哪方面倾斜,还真是个问题。

面对质疑,南宁市交警支队负责人称,购置宝马车符合程序要求,言外之意是说,该过的关口都过了。这显然也难以服众。因为,所谓的程序要求,无非是“内部”的规定。如果这个规定本身就不尽合理,符合这个规定又怎能说正确呢?

交警提升形象,就目前社会反映而言,根本上要靠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,靠规范执法、文明执法,改善交通环境,不是有了高档漂亮的办公场所、交通工具就能够实现的。舍本逐末,“宝马加身”,非但提升不了形象,还有可能给国家形象抹黑。

“我管不上”折射监管病态

一句赤裸裸的“我管不上”,反映的正是当前某些政府部门对百姓利益作壁上观的懒政和不作为。

■廖水南

陕西安康的居民饮用水被附近的垃圾处理厂污染。自己深挖的机井抽上来的水也只能洗衣服,饮用的水只能靠到城里熟人家里去讨要或买矿泉水喝。当地城管局副局长以现在水源为村民自选为由,称“再有污染我们就管不上了”。(7月26日《西安晚报》)

这句赤裸裸的“我管不上”,反映的正是当前某些政府部门对百姓利益作壁上观的懒政和不作为。

其一,这些部门的“管不上”,并不是真的管不上,而是在回避、掩饰此前监管缺失的责任。按照安康市城管局副局长的说法,2004年当地村民曾另行选址新建了水源井,但这种关乎民生的大事为什么不是通过政府部门科学选址呢?

其二,在有关监管部门看来,垃圾污染这东西实在不好管,不仅没有什么油水可捞,而且劳神费力。相反,若是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,早就抢着上了。比如当下,一些地方监管部门和工作人员“执法为利”就显得积极多了。

其三,“不归我管”更是对民众利益的忽视。在当地群众都喝不上安全水的情况下,监管部门还在怪罪百姓选址错误,却浑然忘却自身最基本的职责,无疑有失公仆本色。

归根结底,“我管不上”折射出一种监管的病态。从“不作为”到执法腐败,其间的距离并不遥远。对此,一方面,纪委等监督部门不能充当“稻草人”,要对漠视公众利益的不称职官员进行有效问责;另一方面,相关法律法规应进一步完善,划清权责界限,让该过者受罚而无可辩驳。

“三公”不能“选择性公开”

“三公”公开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步,作为百姓的我们,不可能总是在枯燥的数据面前目瞪口呆。

■马龙生

截至前天,98个中央部门中,七成多的中央部门的“三公经费”逐一亮相。然而,两个月以来,各部门“精炼”的表格和简短的注释,对于不具备专业知识、不清楚相关背景和标准的普通百姓而言,不啻于深奥、难懂的“天书”,渴望知情的公众,普遍感觉不解渴。((《京华时报》7月25日报道))

从公开内容简单粗陋,面对质疑不予回应,从而被公众质疑“为公开而公开”;到公开内容无人把关“自说自话”,从而被质疑为“选择性公开”……做法上绞尽脑汁,耍点小聪明,是“态度不积极”的必然反映。对此,公众全都看在眼里,有关专家更是呼吁,不要低估百姓的智商。那么,在监督“三公”支出方面,公众的智商又体现在哪里呢?

其一,公布的数据多数人看不懂,不等于没人能看懂。网友中不乏“藏龙卧虎”之人,情况熟、门槛精,揭露问题直击要害,信息传播力度也往往大得惊人。这种“开口小,捅得深”的杀招,常常让一些瞒天过海者始料未及,难以招架。

其二,百姓看不懂枯燥的绝对数,不等于放弃对相对数的追问。信息只有体现了客观情况,能够让人看得清楚明白,可以进行基本的对比分析,监督才有可能,这就需要更多以“率”为主的相对数,以及对“率”做出详细说明来支撑。达不到这个要求,百姓的追问肯定不会停止,被动的角色就无法转换。

其三,百姓看不懂数据概念,不等于不会向生活寻求答案。如今的“三公”消费,很多并不是预算超支那么简单,更多还是当事者理直气壮,公众觉得极不正常的“制度性不公”。但是,只要“政府在花纳税人的钱”这一点无法改变,百姓监督的眼睛就不会闭上。

七成多中央部门的“三公经费”逐一亮相,尽管人们还有诸多不满意,但大可不必失去信心。从大的潮流趋势看,“三公”公开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步,为谁公开、谁来公开、怎么公开的问题,必然得到逐步解决。作为百姓的我们,不可能总是在枯燥的数据面前目瞪口呆。